

曹操许田射鹿的文本传播及学术史意义

· 杨 波 ·

内容提要 曹操许田射鹿是三国故事流传过程中一个耳熟能详的桥段。正史中没有较为明确的记载,其本事之雏形始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之引文。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对曹操许田射鹿的相关情节进行了通俗演绎,使这一故事广为流传,其故事框架和情节基本趋于定型。而明传奇《青虹啸传奇》和清编历史剧《鼎峙春秋》则采用戏曲形式对其进行重新改编,从侧面反映出明清时期学界对曹操许田射鹿一事的不同看法与接受。通过梳理曹操许田射鹿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在表现内容、主题思想、文体形式、社会功能等方面各有特色,具有较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 曹操 许田射鹿 本事考察 文本传播 后世影响

清人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曾对三国时期的众多人物形象进行过精辟的评价:“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人才之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①被毛宗岗誉为“三绝”(即诸葛孔明、关云长和曹操)之一的曹操,有“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之称,是东汉末年政治舞台上当之无愧的主角。在历代以曹操事迹为题材创作和传播的三国故事中,曹操许田射鹿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桥段,但因其特殊的地域和文化背景而具有典范的学术史意义,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

一、曹操许田射鹿的本事考察

曹操许田射鹿,又称“许田打围”,是三国故事流传过程中一个耳熟

能详的桥段。建安年间,汉献帝刘协认刘备为皇叔一事,引起了曹操及其幕僚集团的警觉,谋士程昱劝曹操趁自己威名日盛时“行王霸之事”,曹操则以“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轻动”为由,决定“请天子田猎,以观动静”^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故事。但是,这个流传很广的精彩故事在晋人陈寿所著《三国志》及同一时期文献中并未见到相关记载,其本事主要来源于南朝刘宋时期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一条文献,最终因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刊刻而广为传播。

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六·关羽传》时征引了《蜀记》中的一段文字,虽然未记述曹操许田射鹿的具体细节,但可以视作曹操借许田打围之举而显露出胸怀天下之志的最早雏形。文曰:

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飘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邪!”^③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东汉兴平二年(195),“长安乱,天子东迁,败于曹阳,渡河幸安邑”^④。建安元年(196)春正月,曹操率军亲临武平,准备在这里迎接天子,秋天终于实现“至洛阳,卫京师”的目的^⑤;八月,因洛阳残破,董昭等人极力劝曹操定都许昌;九月,汉献帝“车驾出轘辕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⑥,使得一度非常混乱的宗庙社稷制度始立;冬十月,汉献帝又拜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而深谋远虑的曹操采纳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开始兴屯田之法。上述这段文字记载及裴松之所注内容,至少传递出五条与曹操相关的信息:

一是时势造英雄。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⑦,当时很多人并未觉得他有何过人之处,唯有梁国的桥玄与南阳郡的何颙二人对他另眼相看,桥玄更是以“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之言激励他^⑧。根据孙盛所著《异同杂语》的记载,曹操博览群书,特别喜好研究兵法,当时主持“月旦评”的汝南郡名士许劭评价其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⑨。另据《后汉书》卷六八《许劭传》记载,曹操尚未发迹时待人接物语辞谦卑,曾经请求许劭为其看相,许劭鄙视曹操的为人不愿评价,后不得已评价其系“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操大悦而去”^⑩。这两种表述异曲同工,从中可见曹操早年已胸怀远大的志向。因此,汉献帝东迁引发了汉末军事力量的变动,也为曹操走向时代舞台的中央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兴平二年(195),李傕、郭汜的两支军事力量在长安火并,汉献帝趁京师大乱之机出逃,却败于曹阳。曹操深谋远虑,力排众议,不顾诸将的疑惑和荀彧、程昱等人的劝告,率兵斩杀黄邵等人、收服一批降将,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雄图大略。而刘备当初没有听取关羽杀掉曹操的建议,认为“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邪”,表现出刘备对曹操“英雄惜英雄”之感受。

二是天道有征兆。关于曹魏政权将承继汉室天下的说法逐渐成型,为曹魏政权最终取代汉室埋下伏笔。张璠的《汉纪》生动地记录了东汉末年侍中太史令王立对这一发展趋势的精准预言。王立身为侍中太史令,精通天时历算,同时也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先后多次向汉献帝和宗正刘艾进谏。第一次,在“天子败于曹阳,欲浮河东下”的关键时刻,太史令王立急忙劝谏,“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⑪。他的及时劝谏打消了汉献帝北渡黄河的想法,转而选择出关东迁。第二次,当汉献帝在曹操护卫下从洛阳迁都至许地后,王立又根据自己的观测结果,向掌管王室亲族事务的宗正刘艾汇报,称天象有变,汉室气数已尽,晋、魏之地必定要有兴起之人。此后,王立还先后多次向天子进言,陈述“曹魏将代汉”的预言。史料中没有记载汉献帝的反应如何,倒是曹操听说之后没有淡然处之,急忙找人转告王立,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⑫,而曹操日后的行为却一一印证了王立的预判。

三是屯田定天下。自古以来,屯田就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据《魏书》记载,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兵荒马乱,粮谷稀缺,军阀到处混战,百姓过着“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的生活^⑬,惶惶终日不知所措,甚至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悲惨景象^⑭。曹操对此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稳定国家的重要手段就在于强兵足食,无论是“秦人以急农兼天下”,还是“孝武以屯田定西域”^⑮,都是前代开创的足可效法的“良式”,所以大力推广屯田政策。文曰:

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⑯

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雷厉风行的曹操未雨绸缪,当年就开始大力实施募民屯田的政治举措,在州郡两级循例设置田官,逐渐积累了百万斛谷,以备征伐四方时所用,从此基本不再有运粮之劳。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募民屯田许下”为曹操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许下”逐渐成为曹操征战四方的战略大本营。

四是许下露峥嵘。上文提到的“许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城邑,又名“许”,相传以高士许由洗耳于颍水之滨而得名,今属河南省许昌市。据有关文献记载,桓公元年(公元前711),郑伯请以泰山之祊易许田而祀周公,后又“以璧假许田”^⑧,鲁国遂许之。“春秋三传”中均有与此相关的记载,其中《公羊传》的注释简洁明晰,“许田者何?鲁朝宿之邑也。诸侯时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⑨。《诗地理志考》卷一“许”条以《春秋谱》《括地志》《九域志》等文献为基础,对许地的历史渊源有简要的考证。概而言之,“许”源出姜姓,与齐同属四岳伯夷之后,因周公封其苗裔文叔于许(即颍川许昌),自文叔至庄公共传了十一世,二十四世为楚所灭。《括地志》载其“故城在许州许昌县南三十里,本汉许县”^⑩,《九域志》载“颍川府许田县,熙宁四年(1071)为镇,入长社”^⑪。

春秋战国时期,许地先后为郑国、楚国所属据,分属韩国、魏国和楚国。秦置颍川郡,下辖许县、阳翟县、襄城县、长社县、鄢陵县等12县。汉高祖刘邦在位第六年(公元前201),析许县,另置颍阴县,均属颍川郡。建安元年(196),曹操至洛阳迎献帝,迁都许县。曹丕称帝后,以白马令李云上事称“今魏基昌于许,汉微绝于许”^⑫,故改许县为许昌县。从此之后,“许下”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名称,而是被历史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后人更是将其与古代人文荟萃之地春秋时期鲁国淹中里、晋代会稽郡相媲美。如“初唐四杰”之一杨炯《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在描述安定临泾籍将军梁待宾的功绩时有云:“家惟万卷,韦实三绝;词高许下,学富淹中。”^⑬宋人叶适《〈徐斯远文集〉序》记载:“初渡江时,上饶号称贤俊所聚,义理之宅,如汉许下、晋会稽焉。”^⑭均为例证。

五是从谏出奇兵。建安三年(198)三月,曹操率军围攻张绣于穰(今属河南邓州穰东镇),五月刘表派兵来救张绣,断绝了曹军的后路。面对前后受敌的危险境地,曹操却对荀彧说:“贼来追吾,虽日行千里,

吾策之，到安众，破绣必矣。”^④曹操设计让对方误以为他要逃遁，在敌军追来时，却带领奇兵前后夹攻，大败敌军。回到许地后，荀彧问曹操为什么如此肯定贼军必破，曹操的答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远见卓识。袁晔《献帝春秋》中有一段文献，述及袁绍麾下的一个叛卒向曹操所透露的军事机密，称田丰早就建议袁绍袭击许昌，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平定四海。这个细节既透露了曹操遇乱不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说明他善于采纳各方人才的建议，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果断抓住袁绍曾经错失的机遇，最终成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的千秋伟业^⑤。诸葛亮与刘备分析天下大势时，认为“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⑥，也从侧面衬托出曹操的政治识见及这一行为对时局的深远影响。

曹操许田射鹿之行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传说中人文始祖黄帝的定都之地逐鹿山和秦朝末年群雄逐鹿中原的行为，自有其更深层次的含义在内。“逐鹿”，也作“争鹿”，语出《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系蒯通应对汉高祖刘邦之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⑦鹿本为猎取的对象，裴骃《史记集解》引张晏语，将其解释为“以鹿喻帝位也”^⑧，“逐鹿”意指争夺政权。后人常用“逐鹿中原”“群雄逐鹿”等词语比喻群雄并起、争夺天下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曹操在地处中原的许田行射鹿之举，对于曹魏政权最终取代汉室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

二、曹操许田射鹿的通俗演绎

罗贯中创作的长篇章回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是最早详细讲述“曹操许田射鹿”故事的通俗文学作品。该书在前代史书、平话和戏曲等文献基础上，虚构演绎出“曹阿瞒许田打围董国舅内阁受诏”等文学情节，使曹操许田射鹿的故事在民间广为传播，也被明清以后的其他文学作品所承袭和演绎。如明代戏曲《衣带诏》《射鹿记》《青虹啸传奇》等都对此情节有所继承和发展，“川剧有《功臣阁》，秦腔有《衣带诏》，同州梆子亦有《许田射鹿》”^⑨，现代京剧中也有《许田射鹿》（马连良藏本）等剧目。在众多涉及“许田射鹿”题材的三国文学作品中，《三国演义》《青虹啸传奇》《鼎峙春秋》对于这一故事主题的传播起到关键作用。

罗贯中《三国演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⑧，用了整整五回的内容（从第二十回至第二十四回），对曹操许田射鹿的故事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演绎，其中穿插了“曹阿瞞许田打围”“董国舅内阁受诏”“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赚城斩车胄”“祢正平裸衣骂贼”“吉太医下毒遭刑”“国贼行凶杀贵妃”“皇叔败走投袁绍”等故事，内容非常丰富，情节更为细致。根据小说情节推断，曹操许田射鹿之事应发生在建安四年。该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汉献帝对曹操弄权掌控国事的过分行为了不满，希望能得到刘备等英雄的相助，于是拜刘备为左将军、宜城亭侯，人称刘备为皇叔。曹操的谋士荀彧等人担心此事对曹操的地位造成影响，曹操则认为当时心向朝廷的股肱之士尚多，不可轻举妄动，决定请天子田猎以试探。在许田行围时，汉献帝看见荆棘中赶出一只大鹿，连射三箭都未能射中，就回头让曹操来射；曹操向汉献帝讨要了天子雕弓、金鈚箭等，一箭射中鹿背；群臣看到金鈚箭，以为是天子射中母鹿，欢呼雀跃；曹操却纵马直出，跑到汉献帝前面接受群臣同呼“万岁”，吓得众人惊慌失措；关羽见状大怒，想要提刀拍马去杀曹操，刘备却慌忙使眼色加以制止，并起身向曹操表示恭贺；曹操口称是天子洪福，却故意不献还皇帝宝弓，而是自己悬带，还在围场之后于许田设宴庆祝。关羽问刘备阻止他为国除害的原因，刘备以担心“投鼠忌器”作答；关羽担心现在不杀曹操，以后必为祸患，刘备却告诉他要保守秘密^⑨。汉献帝回宫后，密赐国舅董承血字衣带诏，命令其纠合诸侯，共同除曹。董承与忠于汉献帝的文臣武将王子服、种辑、吴硕、吴子兰、马腾、刘备等人共立义状，事未成而泄露，董承、王子服等五人及全家被处斩，马腾屯军西凉，刘备等人则趁机掌控徐州。此后各路军事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台，将东汉末年众多政治军事集团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尖锐斗争局面刻画得跃然纸上。

从情节上看，小说中关羽和刘备回到许都的一番对话，与上文裴松之注《关羽传》时所引《蜀记》内容相吻合。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先主（指刘备）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

伏诛。”^⑧这段文字中提及的关键人物共有汉献帝、曹操、刘备、董承、种辑、吴子兰、王子服等七人，直接参与谋划刺杀曹操的五个人，除了刘备因故未至而幸存外，董承等四人均被杀害。由此可见，“许田射鹿”是“衣带诏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也是引发后来一系列政治震荡的重要环节。

在早期的正史记载中，史官在描写曹操与汉献帝之间的矛盾时，对曹操的态度相对公正，称呼其为“曹公”。而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以蜀汉政权的英雄行踪为主线，将曹操塑造成破坏儒家纲纪的乱世奸雄，多次用“曹阿瞞”“操贼”“国贼”等贬义色彩浓厚的词语称呼曹操。如小说在叙述“许田射鹿”的主要情节时，没有提及西凉太守马腾，只是写马腾在探访董承、密谋锄奸时，说出“许田射猎之事，吾尚气满胸膛；公乃国之至戚，犹自滞于酒色，而不思讨贼，安得为皇家救难扶灾之人乎”^⑨这样慷慨激昂的话语，并告诉董承愿意统领西凉兵将作为外应，还讲出自己在围场亲眼目睹了曹操迎受众贺时关羽的表现，认为“云长在玄德背后，挺刀欲杀操，玄德以目视之而止。——玄德非不欲图操，恨操爪牙多，恐力不及耳”^⑩，建议董承找刘备商议对策。再如太医吉平，本来是受汉献帝指派为董承医病，一次听到董承在睡梦中大骂“操贼”，主动提出借为曹操医治头风病之机用毒药害死曹操，同时表明“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的决绝态度。因董承的家奴秦庆童和侍妾云英的告发，导致“衣带诏事件”泄露后，曹操对参与密谋的一千人等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吉平熬刑不过撞阶而亡，董承、王子服、吴子兰、种辑、吴硕五人及其全家老小，全部押送各门处斩，因为此事而死者共七百余人，甚至连身怀五个月身孕的董贵妃也被勒死在宫门外，严令“今后但有外戚宗族，不奉吾旨意，辄入宫门者，斩。守御不严，与同罪”^⑪。从这些身份地位不同却不约而同地主动要求参与暗杀曹操的人物言行中，可以看出作家“尊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三、曹操许田射鹿的重编传奇

孔尚任《桃花扇小引》说过：“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⑫明传奇集文体与文学的双重功能于一身，其“一语一调，能令人酸鼻而刺心，神飞而魄

绝,亦惟词曲为然耳”^⑧,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叙事节奏、审美趣尚、社会功能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创作特点,为戏曲艺术的综合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明代戏曲作品《青虹啸传奇》对曹操许田射鹿故事进行的重新改编,将“传奇”这一文学样式的鲜明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

《青虹啸传奇》,又名《青虹啸》或《檐头水》,在经典戏曲文献中屡见著录。清无名氏编《传奇汇考标目》卷下著录有明人所撰传奇,其中有一条录作“邹玉卿,号崑圃,长洲人。《双螭壁》《青缸啸》”^⑨。该条目文末有自注,云“‘缸’,疑是‘虹’”,讲明该字或为传抄过程中形近误书。《曲考》《曲海总目》《今乐考证》等文献则将其列为无名氏之作。现存梅兰芳藏旧抄本、郑振铎藏传抄本等。《古本戏曲丛刊二集》(第67册)据郑振铎藏传抄本影印,上海商务印书馆又于1954—1955年间影印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硯秋玉霜簪戏曲珍本丛刊》(全44册,第13册)也收录有《青虹啸传奇》,较为完整、系统地保存了明清以来梨园艺人场上演出的曲本。下文征引该剧本相关内容时,主要以《古本戏曲丛刊二集》为依据,随文标出卷次和小标题,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青虹啸传奇》分上、下两卷,凡三十出,每卷目次均为二字词语,如卷上目次分别为“述略”“谒陵”“议疏”“弹剑”等,卷下目次分别为“山隐”“弑后”“逼封”“全孤”等,最后以“雪冤”作结。与此前三国题材的文学作品相比,《青虹啸传奇》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可谓“半出臆造,半据演义”^⑩。全剧以曹操“许田射鹿”为起因,以“衣带诏事件”为线索,综合运用了多种叙事手法,用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表现出东汉末年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颂扬了以董承父子为代表的忠臣志士,表达了对曹操许田射鹿时凌辱天子、意图篡位代汉的飞扬跋扈之举的抗争,以及忠臣志士为保存汉室血脉而忍辱负重的曲折经历,旨在宣扬忠孝节义的价值观念。

《青虹啸传奇》约创作于明代后期,在叙事主题和故事情节等方面都深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同时又有作者自己的艺术创造。在《青虹啸传奇》中,作者将故事的主人公设置为以董承父子、董圆夫妇为代表的一群忠臣义士,而将曹操视为“恣肆奸雄,威压天子”的反面角色,具有鲜明的“二元对立”倾向。从叙事模式来看,该剧采取了常见的“总一分一总”的叙事结构。卷首“述略”以一阕【沁园春】拉开序幕,高度概括

了因曹操擅权而引发的一系列曲折故事。文曰：

【沁园春】(末上)汉祚衰微,曹瞒秉政,篡逆凌夷。羡董承泣诏,伏完歃血,吉平啮指,议鸩奸回。悍庆淫英,成奸虑罪,暗首权奸起祸魁。忠王事,极刑拔舌剜目不心灰。堪悲。宫禁多危,伏后尸夷,绞贵妃痛君绝乳。高公存汉,送姑抚养,得认皇姨。忠矣董圆,更名司马,整旅中兴复帝畿。将冤雪,檐头滴水,毫发不差移。(《述略》)

作者在对“曹操许田射鹿”一事进行深度渲染之前,首先借第二折《谒陵》中董承的一段唱词,交代了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和自己担忧社稷倾危的一片丹心,接着又在念白中引出主要线索人物,即“虽非翰苑之流,颇也头角稍异”的儿子董圆,“喜贤淑温良,堪称全德”的儿媳伏氏,昔年被主上钦点守陵且能一起商议朝政大事的契友司马懿等,在情节结构上具有草灰伏线的作用,从正面表达出鲜明的政治立场。唱词如下:

【喜迁莺】(生上)孤忠霜凜,叹国社倾危,宗庙流离。寸志难酬,补天无计,空自泪眼愁眉。一片丹心常在,满腔热血羞灰。魂梦犹斩奸邪,敢忘汉室?(第二折《谒陵》)

曹操是该剧的第一反派人物,上场即以一阙**【破阵子】**表达自己志满意得的心情:“笑握山河盈寸,雄威远振凌云。伯业图王施暴政,喜负雄名压众臣,手持乾与坤。”(第三折《议疏》)他在一段念白详述了自己的出身与威望,自承“挟天子之威名,令诸侯之臣服。出将入相,为诡诈之班头;罔上欺君,作奸雄之领袖”(第三折《议疏》),认为自己门下有谋士,帐前有虎贲,长子、长孙可承大业,“目下虽为首宰,终为天下之主”。面对“各霸一方”的孙权和刘备两方势力,曹操集团确定了“先图汉室,后灭二雄”的战略方针。曹操命张缉与孙子曹芳一起到边关犒军,施惠士卒,以窥将校动静,同时又让华歆上疏,奏请皇帝出行狩猎,借此探听人心。这一招数逼得汉献帝“俛首攒眉声未阻,施礼陪颜反谢劳”(董圆语),就连内侍高文长也感慨“(曹操)威行四海振天高,挟官家轻似草,

许田巡狩难推掉”。众人眼中曹操的飞扬跋扈之举,从侧面反衬出曹操取代汉室的昭然若揭之心。

在第五折《畋猎》中,出于情节叙述和主题表达的需要,作者对“许田射鹿”的相关情节进行了重新改编,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曹操手握重权、志满意得的精神状态和高明的政治手腕。在曹操看来,他“身经百战,德望俱隆”,门下文有辅弼之臣华歆、张缉等,武有虎贲之士许褚、乐进等,又有可以承继大业的子孙曹丕、曹芳等,生平最大的遗憾就是孙权、刘备各霸一方,与曹氏鼎分三足,于是定下先图汉室、后灭二雄的宏大战略。为了实现自己早登九五之尊的夙愿,曹操双管齐下,一方面命属下张缉同曹芳到边境犒军,假借施惠士卒来窥探军中将校的动静,另一方面指使华歆上疏,奏请皇帝出狩,借机试探朝中大臣对此的态度。

除了采取生动的直接描写外,作者还大量运用了间接描写的手法,通过汉献帝夫妇、董承父子、董圆夫妇、伏完、司马懿、吉平等入闻曹色变的描写,从侧面反映出曹操对朝局把控之严酷。如董圆告诉伏氏,曹操“把一门子侄咸封爵,只恐四海山河半属曹”(第四折《弹剑》),可是身为天子的汉献帝只是“俛首攒眉声未阻,施礼陪颜反谢劳”;当华歆上疏请求汉献帝前去畋猎时,董承以“陛下乃万乘之尊,四海之主,方今烽烟四起,奸佞踵生,只宜深居紫禁,岂可郊野驰游?”(第五折《畋猎》)为由,请汉献帝“即刻返驾”,被曹操一句“臣闻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时出郊,示武天下。方今干戈扰攘之秋,畋猎甚有利益。圣驾已发,万无还宫之理”(第五折《畋猎》),轻描淡写地驳斥回去,落得个“威行四海振天高,挟官家轻似草,许田巡狩难推掉”(第五折《畋猎》);满朝文武大臣摄于曹操的淫威,不但无人敢弹劾曹操,反而“怀忠少,但额颡躬曲,袖手旁瞧”(第五折《畋猎》),从中可见曹操对朝堂局势的全面掌控之严。

射猎结束返回许都后,董圆有一段内心独白,内容与《三国演义》中的相关情节高度相似。当时,汉献帝射鹿不中,曹操竟然夺过圣上的雕弓射中鹿后,不仅挡在献帝前面接受各营将士的欢呼祝贺,而且称“些须小技,不劳称贺”,最后竟把圣上的金钏玉箭悬挂在自己的腰间,丝毫不加收敛;而当董圆愤恨不平想拔剑杀掉曹操时,其父董承见贼人牙爪甚多,因恐其遭祸而拂袖拦挡。上述情节从多个角度刻画出曹操

复杂多变的奸雄形象,但与《三国演义》中情节不同的是,剧中想要杀曹操者和阻止其杀曹操者,改编成了董圆和董承父子。

作为剧作塑造的反面角色,曹操的唱词【四园春】“富贵由天岂浪谋,一腔心事未能酬。群奸投鸩费追求,血诏偷传恨未休。不分君与后,冤债结从头”,表现了他在人生最巅峰的时刻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顾一切伦理纲常的政治魄力。面对曹操欺君罔上之行径,汉献帝对其恨入骨髓,甚至将其与王莽、董卓相类比,背地里痛骂他“嚼民脂蠹国相尤”,公开场合在行动和言语上却不敢有任何抵触。而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董圆,则以一阙【南普天乐】表达其对奸雄当道“僭君恩邀臣颂”、强悬挂皇帝的玉箭雕弓、“实欺君罔上难容”的愤慨,以及“叹忠忱气涌,丹心贯日虹。堪讶随朝文武,似哑如聋”的无奈与悲凉。剧中董圆常用“自古道受王恩,食天禄,忠孝要昭昭”(第四折《弹剑》)来提醒自己,时刻准备着“保驾宁辞汗马劳。留取丹心贯日月,青虹一啸助功高”,最终得遂心愿。此外,剧中其他人物对曹操的多种称呼,如“曹贼”“操贼”“国贼”“奸雄”“元奸”“奸佞”“佞臣”等,也都从侧面反映出明代文人对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看法与接受。

四、曹操许田射鹿的道德教化

借用戏曲形式宣扬传统道德教化,是清代宫廷大戏《鼎峙春秋》创作传播的主要宗旨。《鼎峙春秋》由庄恪亲王允禄奉敕所撰,计十大本,每本又分为上、下两部,每部12出,共计240出戏。现存首都图书馆藏清内府钞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升平署钞本和昆弋腔工尺谱本、绥中吴氏藏钞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双红堂文库零残本等版本。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收录有此剧,系根据首都图书馆藏清内府钞本影印而成。

《鼎峙春秋》是一部以三国故事为蓝本的历史剧,更是一部宣扬封建伦理的教化剧。全剧开头借开场人之口,用一阙词表明本剧的写作宗旨:“海宇承平,取汉家遗事,鼓吹休明。献帝皇纲不振,宦寺持衡,萑苻啸聚,裹黄巾舞弄刀兵。欲戡乱,贼还继贼,始终貽患宫廷。赖有中山英嗣,在桃园结契,金石联盟。各抱满腔忠义,南北纵横。草庐算定,魏蜀吴,鼎足支撑。把贤奸面目,一齐都付新声。”(【汉宫春】)剧本充分利用戏曲舞台演出的特点,借助三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通过天庭、地域与人间的场

景转换,重点褒扬那些为蜀汉政权尽忠效力的忠臣义士,同时大量运用“怪力乱神”等超现实的力量来宣扬因果报应思想,以传递忠君事亲、惩恶扬善、劝诫教化之目的,表现出鲜明的善恶观念和是非标准。

《鼎峙春秋》第二本(下)第廿二出至第廿四出,讲述了清代戏剧家笔下的“曹操许田射鹿”等故事。在第廿二出《黄金殿皇叔承恩》中,听说刘关张三人昔日曾大破黄巾军,今又有擒拿吕布的盖世功劳,汉献帝龙颜大喜,认刘备为皇叔,封其为宣城亭侯左将军、领徐州牧兼豫州牧事,并设宴款待众位大臣。席间,汉献帝明言袁术在寿春称帝是其心腹之患,曹操则以“万岁宽慰,不日臣当剿除”之语予以宽慰,并趁机提出请汉献帝出猎郊外,表面上是说“保驾万岁出猎,第一美事,臣愿保驾”,实则对汉献帝认刘备为皇叔一事耿耿于怀,想要借机杀死刘关张兄弟,以消心头之恨。

在第廿四出《猎许田君弱臣强》中,剧作家详细描述了参加许田射猎的各方势力的不同反应:汉献帝身处君弱臣强的窘迫境地,急于寻求其他势力与曹操相抗衡,所以对刚刚相逢的远房宗亲刘备寄予一份厚望,不仅封官晋爵认皇叔,而且对刘备及其麾下将领也大加赞赏,称赞关羽“好美髯也”,张飞“真乃猛将也”,当听刘备说“臣等闻知陛下出猎,特来随驾”时立即说“甚好”,看到刘备一箭射中白兔时盛赞“皇叔好神箭也”,而对于曹操的建议在言语上不敢违背,行动上战战兢兢,内心里愤恨无奈。刘备的军事力量稍弱,名义上被汉献帝尊为“皇叔”,内心对手握军政大权的丞相曹操心怀忌惮,担心皇帝出猎西郊,恐曹操有不测之机,所以特意叮嘱随行的关羽和张飞必须小心。曹操虽然掌握着军政大权,但在表面上还不得不维护汉献帝的正统地位,在许田射猎时故意提出两种不同的射猎方案,以突出其个人政治地位,反映出一位政治枭雄的双面心理。

第一次众军合围赶出一只白兔,曹操向汉献帝提出了射猎方案,即“白兔儿必须大臣开弓”。剧作家以文王游渭水作比,通过【双角套曲·胡十八】中短短二百余字的唱词和对白,生动地描述了当日几方势力相互试探、彼此设防的情形,将汉献帝内心深处的纠结、刘备异乎寻常的谨慎、曹操怒而不发的隐忍等情状表现得惟妙惟肖,也为接下来曹操许田射鹿的僭越行为做了铺垫。而【双角套曲·锦上花】中的一段唱词和

对白,则描绘出曹操取代汉室的勃勃野心。第二次众军合围赶出一头象征祥瑞的白鹿时,曹操假装恭敬启禀汉献帝,称“白鹿世之罕物,请万岁开其宝弓,放金钃御箭”,并提前知会众军,如果“万岁射中白鹿,众军齐下马,呼万岁三声称贺”,看似为汉献帝的声望考虑,实则另有谋算,提前加以铺排渲染;汉献帝挽起雕月弓,搭上狼牙矢,连射三箭,却因股肱无力未能射中,心情无比沮丧;这时曹操却“夺弓推献帝科”,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并毫不掩饰地喊出“奋平生勇力,你看万人环立,只教那白鹿儿死吾手里”,直接一箭射中白鹿;众军不知是否看到真实状况,只知道白鹿被射中,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喊,引得曹操哈哈大笑;最后,众人唱着豪迈的【双角套曲·清江引】,在“今朝射猎多豪气,获兽如山积”的凯歌声中旌旗招展,至于那一片欢歌笑语声背后,又有几多欢乐几多忧愁,恐怕只有当事人才体会更深刻。

《鼎峙春秋》的故事内容主要取材于《三国演义》,不仅将小说中的三国故事全部囊括在内,甚至连“情节发展脉络也与小说大体一致”,同时在体量、规模、结构、背景等方面也有所拓展,与元杂剧中的三国戏相比,“容量更大,结构更恢宏,画面更广阔”,堪称“一幅完整的三国风云图”^⑩。这部鸿篇巨制虽然以《三国演义》为蓝本,但在细节处理上则多有延展,反映出清代剧作家旨在宣扬传播儒家伦理和道德教化的传统思想倾向。剧中参加许田射猎活动的人物分两拨出场,主要人物有汉献帝、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董承、马腾等,与《三国演义》的记载基本一致,只是在人物关系及主次处理上略有差异。在“翊袞旒赤心共吐”一出戏中,马腾出场时自称“钦承王命入神京,不料奸曹祸渐成。四百年来绵汉祚,丹心一点恨难平”,因听说汉献帝让老官监赐国舅袍带,所以特地到董承府上探问究竟,恰逢董承正与赤心报国的名医吉平商议如何为国除奸,于是三人约定盟誓要除掉曹操。剧中董承等人密谋之初并未泄露,因曹操“梦见五马拱槽而食”,“又梦见一犬扑着我,幸得猎人射退,方才得脱”,向张辽问吉凶,张辽认为梦境预示必有刺客,要仔细加以防范,所以对吉平参与谋害曹操之事由怀疑到确认,吉平最终受刑不过触阶而死。此外,与《三国演义》情节处理不同的是,剧中向曹操告发的两个仆人名叫苗泽和春云,而吉平在这二人告密之前已经自尽死亡;马腾拒绝了侄子马岱让其逃生的建议,认为自己与国舅同谋杀

贼,不愿独活,所以坚持与其一起骂贼而死,表现出董承、马腾、吉平等忠臣良将、爱国志士的责任与担当。

五、曹操许田射鹿的学术史意义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三国志提要》所云:“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⑩ 历代关于曹操许田射鹿一事的文献记载、文学创作和文化评价,反映出东晋以来作家审美趣尚受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程度之深,自有其学术价值所在。

首先,从政治层面看,“许田射鹿”事件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幕后走向台前的关键节点。这是曹操其人容易引起各种后世纷争的直接诱因,其深层问题还在于“正统论”思想的深远影响。历史上有一个看似混乱复杂、实则非常有趣的现象:西晋是一个统一的王朝,《三国志》和《晋书》以魏晋为正统;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长期对立,习凿齿《汉晋春秋》于是“以蜀汉为正统,曹魏为篡逆”;唐太宗李世民《祭魏武帝文》对曹操在东汉末年群雄并立背景下的丰功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昔汉室三分,群雄并立。夫民离政乱,安之者哲人;德丧时危,定之者贤辅”,肯定“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甚至与“伊尹之匡殷室,王道昏而复明;霍光之佐汉朝,皇纲否而还泰”相比更胜一筹^⑪;北宋赵匡胤一统天下,司马光《资治通鉴》仍以魏晋为正统;宋金时期朝廷南渡,朱熹《资治通鉴纲目》遂再次以蜀汉为正统。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三国志书法》中曾分析其深层原因:“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⑫ 其实,无论是陈寿撰《三国志》时以曹魏政权为正统,还是习凿齿撰《汉晋春秋》时以蜀汉政权为正统,亦或是“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的观念^⑬,都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所造成的,折射出东晋以来史学观念与政治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⑭。

其次,从社会层面看,“许田射鹿”情节符合封建王朝宣扬教化思想

的社会心理和内在逻辑。通过戏曲、小说、绘画等媒介宣传社会教化思想,是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做法,彰显出创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注,也映射出不同时代鲜明的道德教化倾向。在《青虹啸传奇》剧作中,“许田射鹿”一事“堪称《青虹啸》一剧的主线,亦为曹操行为引起非议的导火索,并为曹魏政权的最后倾覆埋下伏笔”^⑧,其中第二十三折《痴拟》详细描述了曹操许田射鹿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中董承府中的家人庆童和婢女云英因偷奸被家主发现后予以惩处,于是“踰墙逃出,投见曹丞相,首他谋叛是实,故此甚得欢心”。曹操不仅将二人配为夫妻,还赏了庆童无终县知县,一时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庆童夫妇虽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典型代表,但剧中关于这些下层人物的情节叙述,既活画出小人得志、喜形于色的真实生活场景,又从侧面反映出曹操用人不拘一格、遇事论功行赏的深层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明传奇塑造人物形象的类型,同时把剧作家强调世情风化的思想渗透在戏曲文本之中,赋予作品以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

再次,从创作层面看,“许田射鹿故事”是曹操从历史真实走向艺术真实的生动呈现。在《三国演义》《青虹啸传奇》《射鹿记》《鼎峙春秋》等三国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许田射鹿”虽然只是其中一个精彩的片段,但是这个故事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却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审美体验:在《三国演义》中,入请天子田猎的是曹操,守护在汉献帝身边的是皇叔刘玄德,因不满曹操“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群臣恭贺而欲提刀杀之的是关羽,慌忙摇手送目制止关羽的是刘玄德,事后预见到“今日不杀奸雄操贼,大哥你看,后必有祸矣”的是关羽。正如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二十回卷首总评中所云:“赵高以指鹿察左右之顺逆,曹操以射鹿验众心之从违,奸臣心事,何其前后如出一辙也”,“曹操无君之罪,至许田射鹿而大彰明较著矣”,“故自有衣带诏之后,凡兴兵讨操者俱大书讨贼以予之。”^⑨《青虹啸传奇》承袭了前代文学作品的情节,却又将其改编成适合剧情发展需要的内容,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呼应自己的叙述主题,其中入请天子田猎的是华歆,守护在汉献帝身边的是董承、董圆父子,因不满曹操向前受群臣恭贺而欲拔剑杀之的是董圆,拂袖拦挡制止董圆的是董承,后感叹“今若不杀国贼,恐早晚生祸也”的则是董圆。^⑩《鼎峙春秋》基本上沿袭了《三国演义》的情节,只是细节更丰富,

戏曲表演的特征更加鲜明。

最后,从传播层面看,明清戏曲的普遍兴盛与广泛传播是曹操形象从“治世之能臣”演变为“乱世之奸雄”的重要因素。正如刘运好《百年曹操文学研究史的学术启示》一文所说:“学术研究固然是个人的创造,带有鲜明的个性,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典籍、意识形态、文化思潮及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刻影响。”^⑨经典的文学艺术是时代的晴雨表,也是传播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明清时期,包括三国戏在内的各种剧目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泛,其影响力也越来越深远。明人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杂调”类收录有《射鹿》一剧,称“曹操之杀董妃,令人愤;马超之败阿瞞,令人喜。惜构词错杂,遂不足观”^⑩,但至少说明这一剧情在民间已有流传。清代宫廷大戏和民间地方戏曲普遍兴盛,“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⑪,“人无男妇,年无老稚,闻将演剧,无不踊跃欢呼”^⑫。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一书曾对三国题材剧目进行梳理,并在《春闺梦》条后按语中指出,“三国故事戏百分之九十皆本《三国演义》,甚至结构、台词亦与演义相近。只有《定军山》《滚鼓山》《斩貂蝉》等数出例外,可能从地方戏移植。至于《黄鹤楼》《单刀会》……则直接继承元杂剧之传统”^⑬。清末无名氏所编《传奇汇考》中也有关于明传奇《射鹿记》的著录:“《射鹿记》,不知何人所作。凡演三国事者,俱各题一事为走,此则据演义‘曹操许田射鹿’一段以作根柢,而要紧人物则刘备、马超,谓其初董承、刘备、马超等合谋图操,其计不就,演至马超归先主。以结局与正史离合参半,不可尽信,亦不为无本也。”^⑭其著录内容可谓言简义丰,考证精审,评论也比较客观。

综上所述,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往往需要漫长的过程,一个经典文学故事的对外传播往往也需要文人创作和民间传说的共同成就。从现有的文献材料看,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大致勾勒出“曹操许田射鹿”的本事雏形,罗贯中《三国演义》呈现出“曹操许田射鹿”的文学演绎,邹玉卿《青虹啸传奇》改编出“曹操许田射鹿”的戏曲传奇,清宫大戏《鼎峙春秋》等则借“曹操许田射鹿”故事宣扬了统治者所推尊的道德教化。这些文献记载、文学创作和文化传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东晋以来作家个人审美趣尚与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和历久弥新的学术史意义。

注释:

①④⑦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 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243页。

②③③③④⑤ [明]罗贯中 著:《三国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78、177—180、183—184、185、214—215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 [晋]陈寿 撰,[宋]裴松之 注,陈乃乾 校点:《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40、13、13、13、2、2、3、13—14、14、14、14、14、64、15—16、16、912、875页。

⑩ [南朝宋]范晔 撰,[唐]李贤等 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34页。

⑪ 杨伯峻 编著:《春秋左传注》“桓公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1页。

⑫ 李学勤 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⑬⑭ [宋]王应麟 撰:《诗地理考》卷一,收入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3046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2—53、53页。

⑮ [清]董诰等 编:《全唐文》卷一九五“杨炯”,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73页。

⑯ [宋]叶适 撰:《水心集》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⑰⑱ [汉]司马迁 撰:《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29、2629页。

⑲⑳ 陶君起 编著:《京剧剧目初探》,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第75—76、114页。

㉑ [明]高儒 撰:《百川书志》卷六“野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㉒ [明]孔尚任 著,王季思、苏寰中 校注:《桃花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页。

㉓ [明]茅一相 著:《题词评曲藻后》,见王世贞《曲藻》卷尾,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38页。

㉔ [清]无名氏 著:《传奇汇考标目》,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第230页。

㉕ 彭飞:《试论〈三国演义〉成书前后的三国戏》,《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㉖ 关四平:《论〈三国志演义〉在戏曲系统的接受与传播》,《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④④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三国志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03、403页。

④⑤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九十三《魏太祖武皇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46页。

④⑥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1页。

④⑦ 关于学界对曹魏政权正统地位是否认可的研究成果,参见李凭《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的文献价值——以〈武帝纪〉为例》(《图书馆论坛》2010年第3期),李凭《曹操形象的变化》(《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周振刚《〈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兼论“蜀国”之称谓》(《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唐玲《〈四库提要〉视角下的北宋正统观质疑》(《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10期)等期刊文章。

④⑧ 杨波:《从明代三国戏看曹操形象的民间传播》,《中州学刊》2016年第12期。

④⑨ 关于《青虹啸传奇》的情节改编情况,参见胡世厚主编、杨波校理《三国戏曲集成·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90页。

④⑩ 刘运好:《百年曹操文学研究史的学术启示》,《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3期。

④⑪ [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第113页。

④⑫ [清]焦循著:《花部农谭序》,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第225页。

④⑬ 王梦生:《梨园佳话》,收入“文艺丛刊甲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1页。

④⑭ [清]无名氏:《传奇汇考》,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5页。

[作者简介]杨波,文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兼任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文化传播学。

(责任编辑:李 由)